

在许多老深圳人的心中，“书城”特指位于深南大道蔡屋围路段的罗湖书城。日前，作为深圳书业的发源地和最老书城，罗湖书城在重装两个月后，正式重新开业。20年来，罗湖书城累计接待读者1亿多人次，举办各类活动5000余场次，累计销售了8000余万册、价值21亿元的图书，总量相当于深圳市图书馆全部馆藏量的20倍。

1996年，深圳罗湖书城在国内首次以“书城”命名开业，一举引发了全国书业竞相模仿的“书城”现象，由此开启了全国大书城发展的新时代。经过20年的发展，“深圳书城”已经成为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大书城连锁品牌。该集团积极适应市场环境、新媒体和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不断进行业态创新和经营模式探索，引领着中国书业历次转型升级；同时，该集团连续15年承办深圳读书月，不遗余力推广全民阅读，为城市涵养人文精神，赋予了书店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新时期书业发展新标杆。

1 国内第一家书城

从书店到书城，一站式服务读者，引领书业风气之先。

开业之初，罗湖书城在全国率先采用全场开放自选的购书大超市模式，一举改变了“看得见、摸不着”闭柜销售模式和“规模小、品种少、环境差”的小书店形象，极大激发和满足了深圳市民的购书需求和阅读渴望。由于参观购书的市民络绎不绝，为了控制人数，开业当天不得不实行售票，5元钱一张门票，这种要买书先购票的方式，在全国图书界史无前例，即便是这样，书城还是人山人海，“长龙”排出了几里路外，书一上架即刻售罄，开业前10天罗湖书城累计客流量突破百万、销售额达到2170万元，创造了书业奇迹。

作为中国第一个书城，罗湖书城在当时不仅因“第一”和“最大”而声名鹊起，而且“敢为天下先”，率先在国内书业采用综合购物超市的经营方式，

内设商务中心、餐饮中心、总服务台、邮电代办所、银行等服务设施，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其独特运营模式，为中国书店改革发展探路。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何春华介绍，当时，罗湖书城推出了一套专业化、标准化、技术化的管理服务体系，打造五星级书城，让全国书业经营者耳目一新。罗湖书城突破传统书店模式，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兴起不久的大卖场以及星级酒店等新生事物，建起一个全新的服务体系和经营理念，即“以书业为核心，以网点为依托，以科技为导向，以服务求效益”。

罗湖书城率先应用自主开发的BIMS信息系统进行连锁经营管理，开创了新华书店系统的计算机信息化时代，自此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纷纷引进该系统。使用高峰时，全国近90%新华书店引进了该系统。



① 罗湖书城换新装
② 升级改造后的罗湖书城
③ 罗湖书城成为一个温馨的大书房

深圳书城20年营造城市“大书房”

首创图书超市 助力全民阅读

杨世国 程全兵

2 “文化万象城”转型升级

从“图书大卖场”到“文化万象城”，让读者得到更高层次的快乐。

罗湖书城自诞生时起，隔几年就来一个旧貌换新装，换的不仅仅是外观、装饰，更是理念。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尹昌龙用“从1.0到4.0版本升级”来形容这些年来深圳书城的发展。

20年来，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对“深圳书城”这一全国最早的大书城品牌进行持续改造提升，打造了引领全国书业历次转型升级的“深圳书城模式”。

从深圳书城罗湖城到深圳书城南山城、深圳书城中心城，再到深圳书城宝安城，深圳书城模式历经1.0版本的“综合性大卖场”、2.0版本的“文化Mall”、3.0版本的“体验式书城”到4.0版本的“创意书城”的蜕变。深圳书城已成功转型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建立了以书业为核心、以书城为阵地的新型文化商业业态，致力于为市民

提供一个集阅读学习、展示交流、聚会休闲、创意生活于一体，关于文化消费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式城市文化生活中心和文化综合体，成为推进全民阅读、涵养城市文明、引领社会风尚的主阵地和重要平台。

不久前，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小甘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调研时，形象地将深圳书城比喻为“文化万象城”。尹昌龙认为，“文化万象城”蕴含着对深圳书城打造“一站式、综合性”文化休闲空间的期待。所谓“一站式”，就是在书城可以待一天，满足文化休闲生活需要；所谓“综合性”，就是不光读书，还可参加活动、比赛、休闲、娱乐，内容丰富。读者到书城来，不仅得到一种阅读的愉悦、休闲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通过创意激荡、思想碰撞，产生更高层次的快乐，“书城，是服务人民的书城，是零门槛的，穷人哪怕是流浪者，都可以把书城当成自己的家。”

3 做好全民阅读传承者

从书店经营者到文化传播者，城市大书房成为全民阅读引擎。

国务院参事、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王京生表示，深圳书城奠定了深圳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阅读传承，奠定了深圳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奠定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全民阅读推广。

深圳书城，伴随着城市的文化成长，见证了文化深圳建设，助推深圳发展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深圳读书月、深圳晚八点、百万市民讲外语、深圳市小学生经典诗文诵读大赛、书城广场创意文化节……深圳书城承办的各类大型文化活动，现已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文化品牌。特别是深圳读书月，经过多年探索，活动影响力与日俱增，参与人数由首届的170多万人次上升到第十五届的近千万人次。平日里，众多阅读文化活动在这里开展，假日更是人头涌动……

2011年，应邀出席第26届大运会开幕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第一次来到深圳。尽管行程安排得很满，她还是在一天之内逛了两次深

圳中心书城，第一次是“考察”，第二次是“闲逛”；第一次是1个小时，第二次是3个小时。当看到很多人席地而坐、埋头读书，当听说许多父母会把孩子放在书城读一整天书时，她感慨“这里的人那么热爱读书，阅读在这座城市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两年后，博科娃来到北京，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深圳市委书记许勤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

现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积极推动大书城小书吧建设，在全市建成若干个以读书活动为主题的书城文化综合体和众多书吧群落，实现“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的布局，推动“十分钟阅读生活圈”建设，实现全民阅读阵地的网络化；扶持民间阅读组织发展，促进深圳民间阅读组织不断壮大，推进全民阅读主题出版，推动更多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读本、教材的出版发行，将全民阅读的故事、典籍、文章等汇编成册，使全民阅读活动以图书的方式传承下去、传诵下去、传播下去。



深圳书城里的购书“长龙”

曾被称为“小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白石龙村有“小延安”之称，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白石龙村地处羊台山脉与宝安县、香港的交界之处，虽然靠近日伪据点，但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游击队指挥部、宝安县均设在这里。本地乡民仅有20户人家，也积极投身抗战，男女老少踊跃参加自卫队、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

1940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成立，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创建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于白石龙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全村不分男女老幼全力支援抗日，羊台山地区成为东江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白石龙的地位日益重要。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聚集在香港的大批文化精英危在旦夕。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别成立了白石龙区委，指挥营救接待工作。数百位文化名人得以从香港脱险，并隐蔽在山高林密的白石龙村，等待向内地转移。村民们积极站岗放哨、搭建草寮、救治伤员、洗衣做饭。一些文化名人以草寮为家，在此停留数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势、谈政治，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并把白石龙称做“小延安”。

1942年在白石龙召开的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会议，是东江抗日游击战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明确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发展方向，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0多岁高龄的黄忠元老人至今仍生活在白石龙，1941年，她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员。黄忠元的娘家在香港元朗，组织上安排她到元朗十八乡，将大批枪支秘密运回白石龙。每支枪重7斤半，她一次可以挑8支步枪，长途跋涉回游击区。文化名人大营救中，她夜里在家煮饭，早上送到山坳草寮给大家吃。说起为什么要加入游击队，黄忠元老人说，当时家里的男人都是游击队队员，作为家属，她也就很自然地要为游击队出一份力。因为经常去山上砍柴然后翻山越岭前往罗湖的东门集市卖，所以游击队的很多药品、绷带等重要物资和生活用品都是她们这些当年去东门“逛街”的女人偷偷买回来的。

“文化名人大营救”

70多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滞留香港，后被东江纵队安全转移至内地，而白石龙正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的第一站。

秘密大营救始于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的1941年末，历时3个月，遍及10余省市，从中共中央南方局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到中共粤北粤南委员会，还有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像一根互相看不见的链条，一环紧扣一环，组成了特别的营救大网。著名作家茅盾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从被困的香港，走元朗罗湖线，经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洲，渡过深圳河，在赤尾上岸，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宝安白石龙村，至此许多文化名人基本脱离危险。无疑，当年的白石龙小村子成了“希望”的代名词。

东江纵队负责的香港一九九一白石龙营救路线是抢救文化名人最多

摊开深圳地图，中轴线上，可以看到两条“铁龙”——一条是贯通香港落马洲、深圳福田和龙华新区的地铁4号线，另一条则是即将开通的广深港高铁。在梅林坳，这两条“龙”与另一条“龙”汇聚在一起，这三条“龙”就是白石龙，一座红色老村。



邹家华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深圳白石龙·「三龙」汇聚「小延安」

陈荻王琳

的一条线路。被营救的除了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胡风、廖沫沙和丁聪外，还有张友渔、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胡仲持、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于伶、凤子等文化艺术界名人。

1942年1月13日晚，游击队员兴奋地接到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名人。据东江纵队老领导王作尧回忆，营救队伍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经过3天的辗转，第一批文化名人约四五十人汇集到白石龙天主堂，其中有邹韬奋、茅盾、胡绳、胡风、戈宝权、叶以群等。由于当时缺粮，村民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但大家还是想办法设“宝安香（狗）肉”晚宴，款待饥肠辘辘的来宾。第二天，这些文化名人便转移到村旁的深山密林中，住在村民们临时搭建的草寮“招待所”里。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少则一两天，多则四五十天，等待向大后方转移。邹韬奋、茅盾对游击队的油印《新生活报》很感兴趣，建议将其改名为《东江民报》。邹韬奋亲笔题写报名，还写了一篇社论。茅盾为副刊题写“民声”，丁聪则画了一批漫画。文化名人还利用这一段时间，为游击队员和群众授课，讲文化，讲政治，帮助当地人民提高抗敌斗争的思想水平。

这次大营救，使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惊心动魄的营救给各位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

经济发展助“龙”腾

如今，屹立在白石龙村口的“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激荡的红色历史。纪念馆于2005年9月2日正式开馆，是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最全的专题性纪念馆。纪念馆位于白石龙社区民塘路入口处。在绿树红花簇拥中，矗立着一块巨大的黄蜡石，上面刻着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几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纪念馆周围的围墙被修葺一新，加盖了青色的文化瓦。乳白色的墙面上，惟妙惟肖地绘制了一幅再现大营救历史的壁画，显露出浓厚的文化气韵。墙角下、围墙边、门口处，种植着数量不少的花卉绿树，景致优美。纪念馆还复原了原建于羊台山上的游击队医疗所、招待所旧址。

今天的白石龙早已告别了农耕的生活，原本靠山吃山的村民，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白石龙股份公司的股东，过上了靠住房、厂房租金和分红过日子的生活。不过，白石龙人没有忘记悠久的红色传统，现在借着广深港高铁和地铁4号线建设的新春风，在“三龙汇聚”的地方，期待着再次腾飞。深圳北站与白石龙社区近在咫尺，地铁4号线从白石龙穿区而过，交通便利让越来越多的外来建设者选择在白石龙居住，社区四周的新建楼盘也越来越多，因“龙”而生的轨道经济必将再次推动白石龙社区的产业转型和旧城改造。

深圳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的城市。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并为为之自豪的故事，文化名人大营救就是其中之一，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记住深圳的根和当代人的责任。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一批又一批民族勇士挺身而出，他们坚持党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在深圳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今天，传统革命精神仍是深圳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铭记历史，就是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为了理想信念努力拼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前进路上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美好的蓝图就一定能够实现。



年过90岁的黄忠元老人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交通员。

温文锋摄